

丽娃河畔的翻译家们

丽娃河畔的俄语文学翻译漫谈

胡学星

丽娃河畔的俄语文学翻译队伍阵容强大，名家辈出，从戈宝权到余振、王智量、王冀刚、朱逸森、许庆道、冯增义、徐振亚、曹国维……几乎都有自己的代表作。而他们共同坚守的翻译原则是忠实于原文，“依实出华”是他们的追求。

1928年戈宝权进入大夏大学学习，在校期间翻译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上帝看出真情，但不马上讲出来》和《高加索俘虏》，成为丽娃河畔俄语文学翻译的第一人。在戈宝权之后，不无默契地涌现出一个俄语文学翻译家序列，前后相继，延续至今：余振、王智量、王冀刚、朱逸森、许庆道、冯增义、徐振亚、曹国维……回眸百年，丽娃河畔的俄语文学翻译队伍不仅阵容强大，名家名译频现，而且还走出了一条风格相近的翻译之路——依实出华。

丽娃河畔的俄语文学翻译，名家辈出。无论对于喜爱俄语文学的普通读者，还是对于研究外国文学的专家学者，戈宝权等人的翻译成就都是有口皆碑的。一提到戈宝权，人们就会不假思索地想起他译的普希金名篇《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以及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还有他翻译的高尔基散文诗《海燕

之歌》。继戈宝权之后，不同年代的翻译家几乎都有自己的代表性译作，譬如余振翻译的《莱蒙托夫抒情诗选》和《马雅可夫斯基诗选》，王智量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朱逸森翻译的《契诃夫文学书简》，许庆道翻译的《死魂灵》和《外省散记》，徐振亚翻译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美好而狂暴的世界》，曹国维翻译的《罪与罚》和《大师与玛格丽特》……

纵观翻译史，这种名家名译涌聚的情形并不多见，这或许应归功于翻译家的学者身份。戈宝权认为，在翻译一部外文作品时，应该尽可能多地了解作品，这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先要对这部作品有较深刻的理解；还要对这位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直至他的文体进行认真的研究。”（《漫谈译事难》）在这一方面，戈宝权本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大夏大学求学期间，他学习过英语、法语、日语、世界语以及俄语，这一优势能让他了解同一作品的多种译本。在翻译象征派诗人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时，他不仅借鉴了胡敦依据俄原文

著完成的译文，还借鉴了两种英译本和一种日译本。1935年戈宝权由天津《大公报》派往苏联三年，后任新华社驻苏记者。1949年又任中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和参赞，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往国外的第一位外交官。大学期间涉猎多门外语，多次赴俄苏工作的经历，都有利于戈先生更准确地体认俄语文学的精髓，让他对目标作品的理解和价值判断更准确。我们看到，1947年戈宝权就已翻译并出版了第一部译文集《普希金诗选》，将“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介绍给中国读者。另外，早在20世纪40年代，戈宝权就已看好并译出象征派诗人勃洛克的代表作《十二个》，极具预见性，因为1980年代才兴起白银时代文学热潮。

当然，学者特有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也让他其他俄语文学翻译家受益匪浅。王智量、冯增义、徐振亚等教授不仅长期从事俄语文学的教学，而且还译介过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而这类工作对加深认识俄语作家或作品大有帮助。戈宝权曾经分享过这一经验，要求译者“首先把这部著作（拟译作品）仔细阅读，阅读有关作者及著作的研究与评价文章，国内及国外的研究文章都要博览”。可喜的是，丽娃河畔的不少翻译家正是这样做的。冯增义和徐振亚教授在翻译《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同时，还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

集》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等文献。这些学者出身的翻译家，出于习惯性的严谨，对拟译作品的考察通常具有综合性，不仅要熟悉作品文本，还要掌握作家生平、创作主张、他人评论与研究等资料。这样做，一者能拓宽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二者有助于前瞻作品的文学价值，克服选译作品时的盲目性。戈宝权之翻译《十二个》，王智量之翻译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徐振亚之翻译普希金的《基坑》和《美好而狂暴的世界》，曹国维之翻译布尔加科夫的《不祥的蛋》，都抢得了译介的先机，而这都得益于他们学者风格的综合性考察。

从翻译标准看，丽娃河畔俄语文学翻译家共同坚守的原则是忠实于原文，“依实出华”是他们的追求。戈宝权这样说过：“翻东西首先应该忠实，要忠实于原文，把原文的意思，原文的形式，甚至原文词句的排列，都很好地翻译出来，而且要使得大家也能理解，这样才能忠实地体现原著。”（《漫谈翻译问题》）戈宝权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专事翻译研究的郑海凌教授对戈宝权的《海燕之歌》等译本作过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就翻译思想而言，戈先生属于‘求信’（忠实于原作）的一派。”

在戈宝权之后的翻译家，尽管年龄和时代语境不尽相同，但全都坚守

翻译要忠实于原文这一原则。

1952年，王智量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俄语专业。之后留在北京大学教书，1956年调入中国社科院。之后辗转河北、甘肃和上海，颠沛流离二十年，直到1978年被华东师范大学聘用。1950年代王智量就已着手翻译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历时三十二年。译本于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一个中译本。此外，王智量还译过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与《前夜》。除了对19世纪文学的译介外，王智量还译过俄国白银时代的诗歌，出版了《曼德尔施塔姆诗选》和《帕斯捷尔纳克诗选》等。南开大学教授王志耕认为，“智量师在国内翻译界是直译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王智量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时，严格按照原有韵律，原汁原味地呈现出“奥涅金诗节”的韵脚、韵味和节奏。而且，他还反对套用中文成语，不赞成将外国人名中国化等做法。《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采用诗体写成的长篇小说，全篇计有四百多个十四行诗节。鉴于原文采用四音步抑扬格，每一行的音节数相同，王智量便采纳了余振先生的意见，将自由体译本改为古典体，做到中

译本每一行的字数完全相等。为了忠实于原文，王智量始终坚持如下原则：“绝不轻易地为迎合中国读者习惯而化用成语或者固定词汇，而是尽可能准确地贴近原文，甚至对于词序也能不动的就不动。”也正是得益于这份坚持，他被赞为国内再现“奥涅金诗节的第一人”。

相对而言，徐振亚和曹国维应是其最年轻的“资深翻译家”，两位教授至今仍笔耕不辍。徐振亚教授曾是上海译协副会长，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屠格涅夫的《罗亭》和《烟》、普希金的《基坑》和《美好而狂暴的世界》、特里丰诺夫的《交换》和《另一种生活》等。要做到忠实于原文，就必须准确理解原文，需要刨根问底。当年，徐振亚老师为弄明白什么是“干葡萄酒”而去酒庄，为搞懂“黑格尔的猫头鹰”是怎么回事而给北大哲学系写信求救。曹国维老师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他秉承的做法是“能直译的不要意译，能简洁的不要烦琐，能紧凑的不要松散”。

显然，在万千学子魂牵梦萦的丽娃河畔，翻译家们之能成一道风景，也在他们所肩负的使命崇高——“为了生命价值的实现”（王智量语），为了“履行自己那一代人的责任”（徐振亚语）。



▲戈宝权翻译《海燕之歌》译本的手稿

▶从左至右分别为：
《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徐振亚、冯增义译——上海三联书店
《洛丽塔》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简·爱》夏洛蒂·勃朗特著/黄源深译——译林出版社

与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相得益彰的是，栖居在“丽娃河畔的翻译家”有一多半从事的是俄语文学的翻译。但是俄语翻译远非丽娃河畔翻译家们带来的全部风景。华东师范大学在改革开放之后以“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襟拥抱了更多的译者；无论是历经坎坷，改革开放后才来到丽娃河畔的王智量、叶治，还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黄源深，他们都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也开创了丽娃河畔翻译家群的新气象。



关于艺术的生命体验

——谈黄源深译《简·爱》

张牧人

不同于少年时代，如今再读《简·爱》反而对其背后的故事产生了更浓烈的兴趣，好奇上一辈的译者如何在一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从事翻译工作。这种好奇诚然来自于一个成长于本世纪的外语学习者的傲慢与偏见，短短几十年，只用一支笔、一本字典的翻译方式竟成了我难以想象的事。也因此附着在小说最后，短短几页的两版译后记令我爱不释手：黄源深在这里记录下了他对《简·爱》横跨快十年的翻译历史。寥寥数百字，译者的生命体验与翻译隐秘地嵌合在一起。在写于1993年的译后记中，黄源深谈及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阅读《简·爱》的体悟；从求学时代视之为“英语学习的范本，反复细读，还详细做了笔记”到岁月流逝之后重读的“‘曾经沧海’之感”。他是勤勉且笃定的译者，视翻译为“开掘”，坚信每一次的认真尝试都能帮助我们“接近完成对一部传世之作的认识”。翻译的乐趣似乎也正在此，它是伴随生命行进无穷尽的探索之旅。

翻译《简·爱》时黄源深正值壮年，这是一个自信坦然、胸有成竹的时刻。已有珠玉在前，他依然欣然接受出版社的邀约，因为一部名著几个译本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他也并不回避翻译的困难，坦陈在用中文呈现男主人公袒露心迹的对话与描写时，“是颇费踌躇的”。这些常常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情感表达考验的并非仅仅是译者的语言技能，翻译也是两个主体和两种情感体系间的互相试探与斡旋。也许，任何文学文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未完成的，读者和译者的加入使意义得以或多或少地浮现。

然而，这绝不是说，《简·爱》译者的自恋游戏。黄源深的两版译后记呈现出的恰恰是一个好的译者所必需的自觉意识和自省能力。《简·爱》中文版发行快十年之际，他对全书进行了校订。这十年内，伴随着英语在中国的迅速发展普及，翻译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的野蛮扩张催生了大量快速炮制的低质译述。在这版译后记中，黄源深结合自身翻译经验，探讨了包括“归化”和“异化”等译界至今争论不休的问题。翻译的难正在于如何恰到好处地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原作者用语言所创造的广阔世界，而这也决定了翻译不仅仅是“熟练的匠人刻意求工的结果”，它同样需要学识、能力、灵气和经验。

这段自述中，最动人的却是经验丰富的黄源深面对翻译时的“胆怯”。他坦率地写道：“年轻的时候往往‘初生之犊不畏虎’，什么都敢译，从不以翻译为难事。但随着年岁渐长，译的东西渐多，反觉得翻译难了，这也是此次校订《简·爱》的体会。”彼时，他在翻译领域和外语学术界已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他的译著《我的光辉岁月》于1996年获得澳大利亚政府翻译奖，他在华东师大一手创办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已经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学者。写于花甲之际，再版后记中对翻译的理论探讨、对翻译产业的反思、和对自身的观照是一名译者历经几十年，见天地、见众生、再見自己的体悟。

距离《简·爱》的第二版发行过去了快二十年。21世纪互联网的蓬勃发展颠覆了我们这代人的阅读习惯。如今，我们可以24小时与线上世界保持联系，这种过度连接在改变我们面对自我和想象世界的方式。信息爆炸带来的新鲜感已渐渐逝去，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焦灼与百无聊赖。我们似乎陷入到了一个闭环：只有更多的信息摄入才能片刻缓解当下的不安，这种被信息填满的自我又同时被一种可怕的匮乏感所笼罩。在这样的危机时刻，重读《简·爱》唤起了某种久违的生命体验。小说开篇借由室内外环境的对比，渲染出阅读如何在脆弱的自我与冷酷的世界之间架起一个安全的屏障。年幼失去双亲的简在被收养她的舅母里德太太斥责之后，独自溜进了餐室，拿起一本书，躲在窗帘后开始阅读，她描述道：“在我右侧，绯红色窗幔的皱褶挡住了我的视线；左侧，明亮的玻璃窗庇护着我，使我既免受十一月阴沉天气的侵害，又不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在翻书的间隙，我抬头细看冬日午后的景色，只见远方白茫茫一片云雾，远处湛蓝流一块草地和受风雨侵袭的灌木。一阵持久而凄厉的狂风，驱使着如注的暴雨，横扫过它。”

黄源深用典雅又鲜活的语言再现了阅读在简心中所唤起的崇高与恐惧感。对幼小的简而言，阅读为在现实生活中孤独且匮乏的她召唤出一个陌生又辽阔的世界。简如饥似渴地翻阅着比尤伊克的《英国鸟类史》，连不感兴趣的文字部分也不舍得随手略过；“导言中的这几页文字，与后面的插图相配，使兀立于大海波涛中的孤岛、搁浅在荒凉海岸上的破船，以及透过云带俯照着沉船的幽幽月光，更加含义隽永了。我说不清一种什么样的情调弥漫在孤寂的墓地：刻有铭文的墓碑、一扇大门、两棵树、低低的地平线、破败的围墙。一弯初升的新月，表明时候正是黄昏。两艘轮船停泊在水波不兴的海面上，我以为它们是海上的鬼怪。魔鬼从身后按住窃贼的背包，那模样实在可怕，我赶紧翻了过去。同样可怕的是，那个头上长角的黑色怪物，独踞于岩石之上，远眺着一大群人围着绞架。”这些骇人又幽远的意象不需要更多的分析与解读，你只须跟着诵读，便能感知它们的力量。它们是专属于孩童的好奇心，是一个懵懂的、尚不顽固的自我与宇宙的共融。

当然，我无意美化，也并不妄想回归前网络时代，身为以阅读为生的人，我深知不同时代阅读方式和阅读功用的多样性。文学能提供的，不必然是宏大的，也许仅仅是《简·爱》中这样的片段，它关乎美、关乎想象，它唤醒我们的身体和感官，拼贴式地融入我们的日常，修补我们与这个世界、与自我的关系。正如袁蓓一在别处所言，文学的功用之一在于用“文字”的性感抵御存在的死感”。

翻译亦然。《简·爱》译后记中，黄源深谈道：尽管“一部作品就其文本本身而言，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凝固，但是译者的审美观点、审美趣向、价值取向，以及他所把握的要传达原作思想的语言，却是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着的。”是的，这个“变”与“不变”之间的缝隙使得译者得以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文本，这种共融又潜在地改变了译者，尽管，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忆“资深翻译家”主万

梁超群

我是少数有幸进过主万（叶治）先生华山路花园洋房的学生。那是1990年，为了我关于《洛丽塔》的学士学位论文，叶先生问：你怎么知道我在翻译（或者是“翻译了”，记不确切了）《洛丽塔》？后来读研究生时，上过叶先生的英语散文翻译课，记得碰上dumb animals一词，先生译曰“哑口动物”，顿时佩服得五体投地，三十年未忘。先生是曾经沧海的人，对人类有极深的怜悯心，当时已经名满圈内了，却没有因为数十年的憋屈而报复性地在辞色间略现一点偏慢，总是那么中正平和、平易近人，有着治病救人的无限耐心。那么好的先生，纵然再年轻狂的学生，也不忍有意无意地冒犯他一点点的。

先生翻译过大量的英美文学作品，一九八六年就因其翻译成就而上过重量级报纸并不小篇幅。这是非常有标志性的肯定，用英语说，这是“非常响亮的证据”，借用纳博科夫的一本书名来说，就是“结论性证据”，百度了一下，说不准，否则会有我意想不到的妙译。

先生翻译《洛丽塔》时，度假不在。他的洋房也还没有空调。“我吃不消。我没有想到今年夏天会这么热。所以今年整个暑假一直赤膊上阵，一直抓得很紧，没停，现在初稿已经完了，我在校。”这是他1994年时的自述。想来那依然是一个没资格装空调的房子。突然想起后来我在给一批暑期来校的美国短期访学学生讲课时一个女学生抛出的一个出其不意的问题：你认为没有空调是不是会影响你们中国人的生产力？我当时不假思索就否定了她的假设。若是现在，我大概还会这样回答，因为中国人极有韧性，极耐高温，例如主万先生。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最绅士、最善良的中国学者遭遇《洛丽塔》，注定是会载入中国翻译文化史的一个事件。

主万译狄更斯、德莱塞们，那是驾

轻就熟的，因为所有这些经典作家，都是西方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经受了中国社会与文化激烈的现代转型的主万，在趣味与思想上与他们不远。但是，曾经勇敢地革命的欧美，经历了一个演化过程后，到二十世纪中叶时，已经没有回头地开始了它的内卷焖燃。这个内卷是无比纠结的，而这种纠结典型地反映在俄裔美国小说家纳博科夫的文字中。《洛丽塔》预言了西方世界的洛丽塔化。世故如欧洲，也为美国的洛丽塔面而倾倒，尽管同时斥之为庸俗、浅薄。洛丽塔成为当今世界各种消费品牌之名，就是一种厄普代克言之凿凿：纳氏是当代英语非韵文创作第一人。

可以说，当时还很天真的中国读者，还没有为批判性接受《洛丽塔》做好准备。我们打开此书时，傻乎乎地准备着体验一次隐秘的“思想解放”。没想到遭受出乎意料的挑战，首先是语言能力方面的：能够读完此书的中国读者，又遭遇第二重挑战，思想的挑战：在某些敏感议题上，诡辩的叙事者挑战我们的立场。中国传统中最可骄傲的一点，就是我们强烈的道德感，这种道德感不允许我们站在非黑非白的灰色地带。这种道德感，面对《洛丽塔》，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遭遇。

都你死我活了，纳氏能拿出他全部的看家本领吗？因此，《洛丽塔》是极

其难译的。因为难译，主万先生的翻译值得我们感恩。我是参考着主万先生的翻译，终于自信基本完全读懂了《洛丽塔》，体验了一次完整的审美幸福。钱钟书先生论述林纾的翻译时，宣告翻译家就是媒婆。察者有资格因林纾用了“拂袖而去”就指指点点（西方人的袖只适合擦拭桌子，不适合表达心灵），但更多的演绎就不必了，就是察而识不了。主万先生以其瑕不掩瑜的翻译，担任了一次真诚且优秀的媒婆。作为一个每年都在课堂上念叨一次《洛丽塔》的教书匠，我对他有深深的感念。

俄语版《洛丽塔》的译者是谁？纳氏本人。他之所以亲自翻译《洛丽塔》，不是因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执念，而是深知翻译就（可能）是背叛：“每一个段落都密布着陷阱，都能导致盲目狰狞的误译”。他尤其提到，有人会把翻译变成了解释。手头有一本我尊敬的2011年译本。作为一个后来者，却一译再下解释（因而出错）之过。例如：

我现在对于奎欧提的完整感觉，就来自于流血事件前那场全身扭打。

我浑身都沾满了奎尔提——沾满了流血而地跌扑翻滚的感觉。（主万译）前者的误译就源自于译者善良的解译动机。原著充满了“奇喻”，奇喻的解读是全体读者的乐趣之所在。想着代劳的译者常不免是强作解人。这种“释译谬误”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译者的通病，在这部小说的各个版本中大量存在（更不可取的是不少很“顺”的“释译谬误”）。作为真正的“资深翻译家”（中国翻译家协会给出的荣誉称号），主万有足够的定力与见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成功地避开了“释译谬误”，挡住了“减译”的诱惑。

主万的翻译是传神的，举例言之，原作叙事者的学术趣味决定了他用词中的“科学味”，先生的翻译对之常常有

精确的还原，不会把“焦点”日常化为“中心点”，不会把“几何图形”日常化为“路线”，不会把“近亲繁殖”含糊其辞地减译（且误译）为“创造”。他对原著思想张力的还原也是高保真的。形容儿童们玩耍时发出的声音集合时，他的“坦率而又神圣的高深莫测”（而不是“直率、却神秘如谜”）还原了天真与神圣之间的张力。“神秘如谜”读来很中国化，很顺，却不信。很多类似的例子，证明了他高于普通译者的思维韧性。

这种宁信而不惮貌似不顺，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如鲁迅先生一样，主万一以贯之地保有以翻译扩张汉语之心，例证之一，就是他尽量还原原著的句子结构，而不是把长句嚼碎了，拆成一个个短句喂给婴儿读者。他之翻译特鲁罗普与詹姆斯，也明显地表现出这种高贵的坚持。

纳氏的思想张力表现在叙事与修辞上，令其作品超越了浪漫主义。中国读者多浪漫主义，以为《洛丽塔》的阅读体验当离艾玛、唐璜、卡门或者康妮不远。没想到一下子被拽出了心理舒适区，于是有了很多激烈的反应，且甩锅忠诚的译者。

我相信，这种文化心理不适体验，学贯中西的译者主万也是经历到的。只是作为一个非常负责任、心灵开放、思维坚韧的译者，他勇敢地完成了与《洛丽塔》的交战，至少打了一个平手。不像我们很多年轻的读者，早早地撤出战场，铍羽而归。主万译《洛丽塔》是个佳作，再深思这个翻译工程与中西在后现代时代的这种文化新遭遇之间的关系，我相信，这将是一个记入翻译历史的事件。且待时间之流的沉淀。

追慕先贤，书在人在。我相信，主万先生因他高度负责的翻译，其个人的思想与精神也经历了一次扩张与淬炼。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